

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

——以許筠與袁黃為中心*

張 崑 將**

摘 要

本文藉由考察兩段明朝與朝鮮政府派遣使節時，檢視陽明學在兩國之間所引起的爭議課題，從而看到陽明學在兩國使節之間所引起的波瀾現象。其一是以一五七四年朝鮮派遣許筠（1551-1588）出使中國時，與中國士大夫筆談有關王陽明從祀的爭議問題；其二是一五九二年明朝政府派往支援朝鮮戰事的軍事參謀袁黃（1533-1606），因其毀朱衛王的態度而引起朝鮮群儒的爭議。本文藉由雙方異域的觀點與批判，以窺兩國知識人對陽明學的不同爭議，進一步探索陽明學在東亞的深刻意義。

關鍵詞：陽明學 許筠 袁黃 使節 東亞陽明學

97.12.05 收稿，98.04.28 通過刊登。

* 本文係參加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日本學習院大學共同主辦的「東アジアの陽明學」國際學術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東京學習院大學，2008.09.21），經修訂後投稿。承蒙《臺大文史哲學報》兩位審查人提供諸多的修正意見，均已參酌改正；另本文在撰寫之初得到韓國學者鄭塔謨博士的協助，提供韓語及韓國史料等相關文獻的解讀及諮詢，一併敬申謝意。

**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十六世紀末，對東亞的中、日、韓三個國家而言，是個彼此牽連而動盪不安的世代，就軍事外交而言，最明顯的事件便是日本豐臣秀吉（1536-1598）在新統日本後不久，於一五九二年發動侵韓之役（朝鮮稱爲壬辰倭亂，一直持續到一五九七年），單就此一事件而言，牽動中日韓三國全面性的動盪不安，影響所及，明廷國勢更爲衰頹，無力應付女真在滿州的壯大勢力。朝鮮受到戰火荼毒，處境更慘，王子被日軍俘虜，儲君之位始終無法受到明廷的肯認，繼任的次子光海君（在位1608-1623）面臨明弱金強的現實局勢，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尊明外交策略。日本方面，豐臣秀吉死後大政轉入德川家康（1543-1616）之手，重新建立長期穩定的武家政權。此外，就學術動態而言，最可注意者便是陽明學的興起，挑戰在中韓被視爲官學正統的朱子學。特別的是，王陽明（1472-1528）死後四十年，於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開始有官員議請王陽明入祀孔廟，引起一番學術激辯，終在萬曆十二年（1584）正式從祀聖廟。在明廷士大夫爭議王陽明入祀孔廟的過程中，一向以朱子學爲宗的朝鮮儒者並未袖手旁觀。朝鮮儒者追隨天朝尊朱的學術立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導致陽明學在朝鮮始終被視爲異端而受壓抑。如今，明廷的學術轉向，因而在異邦朝鮮儒者內部引起何等爭論，確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近年來東亞學者漸能從跨國的「區域交流史」的互動過程中，深掘東亞文化交流的豐富內涵及意義。¹本文扣緊上述十六世紀末的時代脈絡與學術氛圍，從一「區域交流史」的互動過程中，以陽明學的爭議爲核心，選擇出使中國的

1 本文所謂的「區域交流史」並非介於「國別史」與「地方史」（local history）之間，而是介於「國別史」與「全球史」之間的跨國文化研究。近年來，超越國別史或一國史觀的觀點，而以「東亞」爲主題或視野的區域交流史研究，似乎已經形成一股研究風氣，舉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以海洋文化交流史爲主，松浦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爲代表；以思想史爲主題的研究者頗夥，黃俊傑教授推動尤不遺餘力，最新代表爲《東亞儒學：經典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以禮儀制度與王權課題的區域交流研究，以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爲代表；此外，長年以中韓日的燕行使與通信使交流研究的夫馬進，即將出版《燕行使と通信使》的一書亦可爲區域史研究的代表，此書目前沒有日文版，但會先有韓文及中文的翻譯版。關於東亞區域交流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論之探討，可參黃俊傑教授最新發表的〈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未刊稿）。

朝鮮儒者許筠（字美叔，號荷谷，1551-1588）及隨軍援朝的明廷士人袁黃（字坤儀，號了凡，1533-1606）等二人，分析二者的朱王學態度在「異區」引起的學術爭議。許筠來自朝鮮，學術傾向與一般朝鮮儒者宗朱斥王一様；袁黃這位享譽中國民間的傳道者則喜王排朱，更有佛、道色彩。他出生早許筠十八年，許筠二十三歲出使明朝時，他已經四十一歲。袁黃隨軍援朝已近六旬，當時許筠已去逝四年。因此，二人雖沒有見過面，學術傾向也無交集，但本文藉二者出使經驗，在異地筆談有關陽明學課題，旨在呈現一位出使中國的朝鮮儒者許筠，觀察到陽明學流行，朱子學受到挑戰，從而擔心國家將有淪亡之虞。相反的是，袁黃這位詆朱尊王的中國士大夫出使朝鮮，竟企圖改變朝鮮儒者宗朱的現象，引起朝鮮群儒的攻擊。本文擬由中、朝這兩位使臣在異地所展現的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學術交鋒，呈現東亞區域交流研究史的另一風貌及其意義。

本文有關朝鮮使節團許筠的材料是收入在《燕行錄全集》中的趙憲（重峰，1544-1592）的《東還封事》（亦收在《重峰集》）及許筠的《朝天記》中有關論議陽明學之內容。此次趙憲、許筠等使節團是在萬曆二年（1574），即朝鮮宣祖七年，為慶祝神宗皇帝十二歲的生日而派遣的賀誕團，一行計有三十六人，有關詳細的日期及路線的考察，以及看到中華文化水平之低落而加以批判，夫馬進教授的〈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國批判〉一文載之甚詳，筆者不再贅述。²有關《朝天記》分上中下三卷，但主體還是上卷，中、下卷則刪除有價值判斷及大部分筆談之內容，此外的內容幾與上卷重複。至於有關袁黃的史料，散落在各處，特別其出使朝鮮材料，中國材料難以觸及，僅能從朝鮮文集中略窺。

二、許筠與中國士大夫的筆戰

許筠出身書香門第世家，父親許曄（草堂，1517-1580）係名儒徐敬德（花潭，1489-1546）門人。年譜載其十歲已能通經史，作詩文純熟亦可成家，聰穎絕倫，過目不忘。《朝天記·序》中載：「美叔（按：即許筠）年甫弱冠，已能盡讀天下書，以文學詞章有聲於朝著。」³曾任藝文館檢閱、禮曹左郎、燕京使書狀官、遠接使從事官等官職。據其年譜載其中國之行曰：「自請為書狀官

2 夫馬進，〈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國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上）》（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547-569。

3 許筠，《朝天記·序》，收入《燕行錄全集》（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冊6，頁14。

赴朝，與中州士大夫論難朱陸之辨，薦紳先生莫敢屈，咸歎服焉。」⁴關於許筠在這次的「自請」出使明朝，事實上有李退溪的東人派排斥陽明學的任務，前此已有退溪弟子柳成龍（西厓，1542-1607）在出使明朝時與明士大夫論辨陸王學的不當，李退溪對柳成龍所發表的「正論」給予相當的肯定；許筠父親許曄亦嘗師從李滉（退溪，1501-1570），學問宗主朱子學，排斥陽明學。⁵因當時中國有陽明學入祀孔廟的爭議，故在沿路中與中國士大夫有一番的朱王論辨。

這次的中國行是萬曆二年由朴希立率領的聖節使赴燕京的賀誕團，許氏詳記於《朝天錄》中。許氏未得長壽，享年僅三十八。著有《荷谷粹語》、《朝天錄》、《北邊記事》、《禮儀刪註》、《夷山雜述》、《過江錄》、《讀易管見》等書。

許筠在出使中國前夕，曾拜訪李珥（栗谷，1536-1584），載曰：

叔獻以病尚未起，命姪子邀余入書室以候。久而出來，觀其顏色，與前月稍異，頗為憊悴，與之對坐，先及時事，為之嗟吒。次論理氣一本，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心統性情，無極太極，明德是本心，良知非天理，及《困知記》不可輕等說，極似穩洽。⁶

李栗谷為宣祖（在位1568-1608）一朝大儒，與成渾（牛溪，1535 - 1598）有過四端七情之辨，⁷同行出訪的趙憲則是栗谷門人，屬西人派。無論如何，他們都

4 許筠，〈荷谷先生年譜〉，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頁350-351。

5 柳成龍出使明廷懷有李退溪排斥陽明學的期望，是因為李退溪讀了西人派尹根壽（月汀，1537-1616）的〈朱陸論難〉一文，得知明朝陸王之學頗盛，故有此交代。故退溪當給出使明廷的柳成龍之書信〈答柳而見〉中稱：「今以辱示觀之，京師，四方之極，聲名所萃，士習學術，污舛如彼，不知是天（使）然耶？抑人實為之？以今云云，揆前日尹子固問答及魏時亮諸說，陸禪懷裏於天下乃如是，令人浩歎不已。然入燕者數多，能遇此等人，作此等話頭者亦無幾，公能遇數百諸生，發此正論，略點檢其迷，不易得也。」《退溪先生文集》，卷之35，收入《韓國文集叢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冊30，頁297。相關研究可參韓國學者김동진（金東珍），〈허봉의 대명사행과양명학 변척（許筠的大明使行與陽明學辨斥）〉，《문화사학（文化史學）》21輯（2004），頁825-853。此外，金東珍的文章亦觸及許曄、許筠父子排斥陽明之學，係受到李退溪之直接影響。由於此文重點是在處理許曄與許筠父子出使明朝前後的朝鮮思想界對陽明學的排斥，並非以出使過程的討論為核心，故與本文的重點取向不同。

6 許筠，《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頁25。

7 李栗谷與成牛溪的四端七情論辯，是延續其前輩學者李滉與奇大升（高峰，1527-1572）的四七之辯，相關研究詳參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

是程朱學者，也是排斥陽明學的人。栗谷在許筠出國之前的「良知非天理，及《困知記》不可輕」的這段告誡，應該不是偶然之語。

如所周知，在朝鮮有「東方朱夫子」之稱的李退溪是「排斥陽明學第一先鋒」⁸，影響所及，學者多視陽明學為異端，其間雖有善待陽明學者，率皆私論，未敢有稱己學為陽明學者。朝鮮採事大慕華政策，當然也是依照明廷的標準，獨尊朱子學。不過，這樣的情形在十六世紀末，因為明廷的從祀陽明之議，多少有些改變，激起朝鮮群儒的爭議。⁹《朝鮮王朝實錄》在萬曆元年十一月即載：

丁酉。聖節使書狀官李承楊《聞見錄》有曰：「中朝有邪臣魏時亮，請以王守仁從祀文廟。南京御史石檟，奏中極駁守仁之邪淫，宜斥去，真為正道立赤熾者也。」¹⁰

其實，在萬曆元年（1573，朝鮮宣祖六年）的正月，朴淳（思庵，1523-1589）作為參與慶賀神宗皇帝即位的使者，在中國感受到了明廷從祀陽明的嚴重問題，回京後即報：

浙江巡撫謝廷傑，請以王守仁配享文廟，大概以為尊德行、道問學非兩事也。德性不可以徒尊。必道問學而後始有實。不然則禪矣。問學不可以徒道。必尊德性而始有主本。不然則功利矣。守仁師陸九淵，而今觀九淵之論，未嘗不及於讀書，朱熹之教門人，未嘗不以身心以為務，則彼分朱陸而二之者，非知二子之學者也。¹¹

由此可知，從萬曆元年開始，每逢出使中國回來的使臣們，皆會報告明廷陽明從祀問題的發展狀況，可見朝鮮君臣也密切觀察著從祀問題之後續發展，甚至出現在君臣的經筵討論上。柳希春（眉巖，1513-1577）則於同月二十一日在經

學探討》（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之第六章〈李退溪與奇高峰關於四端七情之辯論〉與第七章〈李栗谷與成牛溪關於四端七情之辯論〉。

8 李丙燾之語，見氏著，《韓國儒學史略》（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86），頁266。李退溪的斥王之論，載於《退溪集》，卷41。

9 有關陽明從祀引起朝鮮朝廷上的爭議，可詳參中純夫，〈王守仁の文廟從祀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國と朝鮮における異學觀の比較——〉，收入奧崎裕司編，《明清はいかなる時代であったか——思想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特別是頁195-208。

10 《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58年太白山四庫本），冊4，卷7，宣祖6年（1573，萬曆元年），11月21日（丁酉），頁55。

11 柳希春，〈上經筵日記別編〉《眉巖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4，卷之10，癸酉正月17日，頁324。。

筵席上，進曰：「今聞皇朝謝廷傑，欲以王守仁配享孔廟，至為朱陸道同之說，變亂為黑，此甚邪說。」¹²又同年三月十七日的經筵討論，朴淳等諸臣入侍，迭相進言，提到「王守仁自聖無忌，詆毀朱子，且有中國好其徑者而和之。陳建（清瀾，1497-1567）著《學蔀通辨》，此實闢異端之正論，宜令校書開板。」王（宣祖）曰：「王守仁亦有才氣，建功業。」柳希春則進曰：「王守仁資性狠戾，彊復不遜，謂五常有亦可，剷而去之亦可，又稱秦始皇焚書，以為合於孔子刪述之意。又毀朱子著書，立言曰慘於洪水猛獸之災，其為邪說甚矣。」王曰：「謂之邪，無乃過乎？」對曰：「守仁當初厭事物之干心，而為乖僻之論，然言之不正，至於此」云。¹³

以後朴世采（南溪，1631-1695）亦曾撰〈文廟配從說〉，對明代諸入祀孔廟者，頗有批評。他說：

嘗聞神廟又以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從祀于兩廡。然而陳獻章之似禪，王守仁之詆賢，即荀況、陸九淵之類。惟此異學最為聖門之大防，又不可以不知者也，因敢以是俟後世君子之裁擇。¹⁴

由上述的背景可知，許筠在出國前一年，陽明學從祀問題已延燒到朝鮮的君臣廷議及經筵講論上，朝鮮國王宣祖還認為群儒反應過度，適度地肯定陽明的事功。¹⁵許筠嘗師從李退溪，對其斥王之論，當不陌生。因此，當他到了中國，詢問中國士大夫有關王陽明從祀的問題時，已經是有備而來的。

觀《燕行錄全集》，可以窺知使節團所經過之路線大同小異，必定經過像南山李廣虎石、夷齊廟、遼東正學書院、三義廟（劉關張三結義）等歷史遺跡。許筠與中國士大夫辯論陽明學的第一站便是正學書院。《朝天記》載曰：

「僕竊聞近日王守仁之邪說盛行，孔孟程朱之道鬱而不明云，豈道之將亡而然耶？願核其同異明示可否？」四人者答曰：「生輩皆居南，諸公居東，今日之遇，接夙緣也。本朝陽明老先生學宗孔孟，

12 柳希春，〈經筵日記〉癸酉正月21日，《眉巖先生集》，卷16，頁458。

13 柳希春，〈經筵日記〉癸酉3月17日，《眉巖先生集》，卷16，頁463。

14 朴南溪，〈雜著·文廟配從說〉，癸丑4月29日，《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正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40，卷55，頁147。

15 宣祖之肯定王學，以後也見之於對壬辰倭亂之評論。宣祖曾與群臣論朝鮮重文輕武之俗時，感嘆地說道：「昔陸象山教子弟習武，王陽明善騎射，我國只持冊子，以教子弟，歧文武為二道，甚無謂也。」可見宣祖對王陽明有相當的好感。參《朝鮮王朝實錄》，冊25，43卷，宣祖26年（1593癸巳 / 萬曆21年），10月22日（壬寅），頁15。

非邪說害道者比；且文章功業俱有可觀，為近世所宗，已從祀孔廟矣。公之所聞，意者偽學之說惑之也。」¹⁶

按此段四儒生提到陽明已從祀孔廟，查諸史實，並非正確。陽明真正入祀孔廟是在萬曆十二年（1584），而許葑與四儒生筆談是在萬曆二年六月末之際，陽明從祀問題正引起諸多爭議。許葑並不滿意四儒生捍衛陽明的回答，接著長篇筆書，由於文章頗長，筆者僅述其大要：(1)批評王守仁妄意更定朱熹的《大學章句》；(2)王守仁對孔子不敬，因其謂「苟不合於吾，則雖其言之出於孔子，吾不敢以為信然也。」(3)陽明之學實出於釋，改頭換面以文其詐；(4)守仁平宸濠功業，乃得力於皇靈及宸濠腹心劉養正（筆者按：應為「劉養正」），而劉為陽明之弟子，故能順利擒宸濠。¹⁷

四儒生接著又答曰：「從祀孔廟乃在朝諸君子輿議，非山林僻見也。且學以良知良能為說，非有心得者，其孰能知之，所聞不若所見之為真，諸君特未之察耳。」¹⁸由於雙方立場互異，許葑最後結束筆談，而自度彼等「固滯鄙賤，不可與辨。」乃書曰：「承教不勝缺然，古云：『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宗朱門，君耽王學，爾月斯邁，吾日斯征，終無可望於必同也。奈何！奈何！」¹⁹

由這一段的激烈筆戰，我們可以得知，四儒生站在捍王立場，許葑則護朱不遺餘力，甚至許葑憂心忡忡，在此日記中作了如下的結語：

由此觀之，則今之天下不復知有朱子矣。邪說橫流，禽獸逼人，彝倫將至於滅絕，國家將至於淪亡，此非細故也。而為儒者轉相眩惑，萬口一談，雖有關邪崇正之論，如石（櫝）、趙（思誠）兩公者，皆不獲施行，至以躋於從祀之列，其污蠱聖廟大矣。嗚呼！此道已

16 許葑，《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頁121。

17 按：劉養正其人，許葑這裡稱是陽明弟子，恐係道聽途說，不確實之論，根據陽明的年譜有關劉養正投靠宸濠的記載：「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詞文名，屈致鼓眾，株連富民，腹剝財產，縱大賊閔念西、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參《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4，〈年譜二〉，頁1258-1259。李士實（曾任都御史）與劉養正分別擔任宸濠的左右丞相，宸濠的〈討正德檄〉一文相傳亦是出自劉之手。根據邵廷采的〈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載陽明在征討宸濠之際，「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若有約內應者。宸濠搜得書，內相猜。」（《王陽明全集》，頁1554）許葑蓋指此事，卻訛傳劉養正與陽明有師生關係。

18 許葑，《朝天記》，《燕行錄全集》，冊6，頁124。

19 同上，頁124-125。

衰，無復可支吾者。為今之計，將如何哉？²⁰

許篈從異邦入中國，看到在朝鮮視為異端的陽明學竟要從祀聖廟，於是加深了他一路上所看到的中國官民腐敗的景象，故說：「邪說橫流，禽獸逼人，彝倫將至於滅絕，國家將至於淪亡，此非細故也。」有點將中國的亂象一股腦兒全推給陽明學，像極了清初顧炎武（亭林，1613-1682）等人批評陽明學為亡國禍首之論。

朝鮮使節團來中國為神宗賀誕的萬曆二年，此時也是王學從祀鬧得沸沸揚揚之際。陽明從祀問題的開始是從穆宗隆慶元年（1567），距離王陽明死後三十八年之事，由於反對者眾，廷議結果，僅同意薛瑄（敬軒，1389-1464）入祀（1571）。萬曆元年（1573）又被重新提了出來。²¹許篈所提到反對從祀的趙思誠是兵科給事中，在萬曆元年三月請罷議陽明從祀；石欝則是南京福建道御史，也於七月上疏反對陽明從祀者，²²距離使節團一行來中國僅一年，而且從許篈反對陽明從祀的意見看來，實不出石欝的上疏意見，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許篈是看過石欝等人反對陽明從祀的上疏文。

20 同上，頁125-126。

21 萬曆元年5月上疏請陽明從祀孔廟的是浙江道御史謝廷傑（疏文見《明神宗實錄》，卷13），以及11月工部辦事鄒德涵（聚所，1538-1581）（疏文見《明神宗實錄》，卷19），反對者亦眾，爭議頗多，故無結果。陽明真正成功入祀是在萬曆十二年，係根據大學士申時行的上疏，並得到神宗皇帝的許可。申時行（瑤泉，1535-1614）該疏文收入《王陽明全集》，頁1560-1562。黃宗義的〈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傳〉，言「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收入《王陽明全集》，頁1545。有關陽明從祀問題之研究，朱鴻林有系列的研究，可參Chu Hung-lam(朱鴻林)，“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1988), 47-70。朱鴻林，〈陽明從祀典禮的爭議和挫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5(1996)，頁67-181。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12-333。此文旨在分析謝廷傑編輯《王文成公全書》與陽明從祀有莫大的關係；換言之，在陽明從祀的爭議過程中，謝廷傑實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王文成公全書》的編成，有助於扭轉陽明只具「事功」而未有「學術」的印象。另外，前引中純夫的〈王守仁の文廟從祀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國と朝鮮における異學觀の比較——〉一文，則透過王陽明從祀問題，不僅比較入祀年代的萬曆十二年前後有關中國內部陽明學的爭議，也詳析陽明從祀問題在朝鮮群臣間所引起的爭議。

22 趙思誠、石欝二者反對陽明從祀之疏文，分別參考《明實錄·神宗》（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6），卷11、15。

許葑如此注意陽明學在中國流行的問題，更訝異陽明竟可入祀孔廟，所以只要一遇士大夫便詢問，以測探陽明學流行的程度。例如以下他過薊州與一名國子監的監生葉本論辨陽明從祀問題，這位葉本出身浙江杭州府，是一尊王學之人，面對許葑的問題。他說：

（陽明）天賦挺秀，學識深純，闡明良知聖學，又有攘外安內之功。穆宗皇帝嘉其績，封其裔為新建伯。今年浙江巡按御史論其學，真足以得往古不傳之秘，宜從祀孔子廟廷，聖旨諭禮部尚未覆，此其較大也。若欲備知，有《陽明文錄》，又有年譜可買查之，謹覆。²³

許葑當然提出反論，言陽明良知即天理之說，是棄事物廢書冊，頗違背朱子居敬窮理、格物致知之教，淪為釋氏之論。葉本復辯，解釋陽明良知學有體有用，與禪不同，陽明也建立了許多事功，可資證明。葉本並引用孟子所說：「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以為陽明常被攻擊的「不合吾意者，雖出於孔子之言亦不信」之說解套。許葑亦不甘示弱，再論(1)陽明只是想像一介良知，即可應萬事，證明其為禪學的遠事絕物，(2)陽明繼承陸九淵（象山，1139-1193），朱子已非之，而陽明之論比起象山又更加奇險，(3)陽明私意改定朱子《大學章句》，妄肆詆訶，心術可議。雙方筆談，以許葑上述之論結束，我們無由得知到底是誰先結束這場筆戰，但亦可窺知，雙方捍王衛朱的互異立場。

許葑一路上問中國士大夫對陽明學的態度，卻一再碰到支持王學的人，不得不讓他感受到中國這樣的學術氣氛，幸好在與葉本筆談後的翌日，找到了視陽明學為偽學的人。以下即是許葑與陝西儒生王之符有關陽明的筆談內容：

余曰：「近世有為陸子靜、王陽明心學者，異於程朱所為說後生，莫不推以為理學之宗，先生其亦聞之否？陝西之人亦有仰慕者乎？」
 之符曰：「陸子靜是禪教，王陽明是偽學，吾地方人則皆闢之矣。」
 余曰：「陽明良知之說是乎？非乎？」之符曰：「良知之說，倚於一偏，非偽而何，聞陽明聚徒講學於家，一日陽明之妻出外詬其門第（弟）曰：『爾何敢相率而師矯偽者乎？』門第由是多散去。²⁴若

23 許葑，《朝天記》，頁202。

24 同行的使節趙憲記載這一段陽明從祀的問答：「午後，與美叔（按：即許葑）就見于其寓。美叔問：『王陽明以何事有從祀文廟之議乎？』曰：『陽明是效象山之禪學而偽者也。當其在家教授生徒之時，其妻出外，口罵門徒曰：『此是偽學，效他什麼？』門徒即日散去，天下皆知其學之偽，而頃有南人為其弟子者多中進士，得擅朝議，敢進邪說，請以從祀，公論即發，事未施行。』由此段可知，王之符是排斥陽明學者，至於所舉陽明之妻口罵門徒之事，是否即是排斥陽明學者所編造之語，

聖賢則豈有不能刑家，致有此事之理乎？然則陽明之學，決知其文飾於外者多矣。邇來請從祀者，徒以陽明之第（弟）子多在朝著，故欲尊其師而廷議或不直之是，以巡按御史上本已久，而禮部尚未定奪矣。」²⁵

由此可知，許錡終於得到排斥王學的海外知音，也似乎得到了困惑已久的解答，也就是為何在中國會有人想以陽明從祀聖廟，根據王之符的回答，乃因陽明弟子在朝者多，「欲尊其師」而請封的結果。王之符所言不差，因為開始提出陽明從祀問題者，與陽明弟子多有關係，根據沈德符（景倩，1578-1642）《萬曆野獲編》：「隆慶初元（1567），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天臺，1524-1596），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²⁶徐階（文貞，1503-1583）當時即任首輔，他即是陽明門人，²⁷而御史耿定向之學本陽明心學（屬泰州學派）。

王陽明死後，渡過了世宗時代對他的不滿——不僅被奪爵，死後亦無恤典——到了穆宗即位，終於得到昭雪，封爵被恢復，擔任首輔的徐階便順勢提出陽明從祀聖廟。這就是王之符所言陽明從祀的背景。²⁸許錡在這樣的王學從祀爭議的氣氛中來到了中國，也正是王陽明被恢復名譽之時。而在連番的筆談中，見識到肯定王陽明的讀書人不少，能見到王之符這樣反對王學者，許錡在日記這樣感嘆：「數千里始得此人，豈非幸哉！」²⁹

不過，陽明從祀問題為何會被提出來，進而形成輿論，在以下許錡與國子監生楊守中的筆談中，則又有另一說法。筆談內容如下：

余問守中曰：「王陽明之學何如？」曰：「陽明單說良知，正是偽學。」余曰：「然則今日何以推崇陽明者眾，至欲舉從祀之典乎？」守中及二三監生不記姓名者答曰：「此亦非天下之通論，南人皆尊陽明，而北人則排斥之，故從祀之議，今尚未定也。」已而門開，

有待考證。參趙憲，《東還封事》，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頁402。

25 同上，頁210-211。

26 明·沈德符，〈四賢從祀〉，收入氏著，《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14，〈禮部二〉，頁362-364。又耿定向的奏文，載於《明實錄》，卷9，〈穆宗·隆慶元年六月〉，頁241。

27 徐階曾督學江西，敬服陽明平宸濠之功，為陽明立祠，並摹陽明畫像贈人，深敬陽明可知。徐階撰有〈陽明先生像記〉，收入《王陽明全集》，頁1350-1351。

28 為陽明入祀孔廟的上疏文，可參薛侃，〈請從祀疏〉，收入《王陽明全集》，頁1494-1495。薛侃亦為陽明弟子。

29 許錡，《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頁215。

余入廡，不暇與守中細語，可恨！³⁰

從監生之說，陽明從祀所引起的爭論，則又有南北士人之爭，此亦不爭之事實。明代從祀孔廟計有四人，薛瑄（山西人）、胡居仁（江西人，敬齋，1434-1484）、陳獻章（廣東人，白沙，1427-1500）及王陽明（浙江人），除薛瑄爲北人外，餘三者皆爲南人且同時入祀。³¹

許筠與中國士大夫筆談有關陽明從祀問題共有六次，以上僅擇重要的四次加以分析。茲將許筠與中國士大夫筆談有關陽明學從祀的問題，表列如下。

表一：許筠《朝天記》六次筆談有關陽明學從祀問題表

萬曆二年	大要	《朝天記》	地點
1. 6月27日	使節團參觀遼陽的正學書院時，許筠與書院學生魏自強、賀盛時、盛壽兄弟、呂沖和（呂東萊之後）等四人，有一段陽明學從祀的問答，雙方立場互異，許筠評儒生爲「固滯鄙賤」，認爲彼此道不同不相爲謀。	頁 121-126	遼寧 遼陽市
2. 7月25日	記明廷大臣有關薛瑄（文清）從祀覆議之奏文，計有二十三臣異同之論。雖人人言殊，但皆以爲可祀，未如陽明從祀問題，爭議不斷。並贊成霍韜請黜陸九淵之論，但不同意去除司馬光之從祀。	頁 182-190	河北 玉田縣
3. 7月26日	過玉田縣，提及尙書霍韜之奏，欲黜陸九淵及司馬光。許筠贊成廢陸反對黜司馬。認爲從祀王守仁乃本於陸九淵之從祀爭議。	頁 192-193	河北 玉田縣
4.	遇一浙江杭州府人葉本，與之辨陽明何以可以	頁 201-207	薊州

30 同上，頁255-256。按：此次筆談內容是因許筠一行在參觀國子監的孔廟之際，因西廡之門上鎖，在等待開鎖之際，偶然相遇楊守中等監生而出現的筆談。

31 有關陽明入祀聖廟，牽涉到中國的南北士人之爭的問題，事實上朝鮮使者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及萬曆十七年（1589）出使過中國的尹根壽（月汀，1537-1616）也指出南北之爭的問題：「守仁敢以朱子比楊墨，凡尊崇朱子者所當辭而闢之之不暇，尚安忍使其晏然於兩廡之祀乎？臣又聞議守仁從祀之時，南北異議。北方則皆主不可祀之論，南方則皆力言可祀。南論人多而盛，雖其論遂行，初非天下公共之論。」尹根壽，〈收議·文廟從祀議〉，《月汀先生文集》，卷之4，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47，頁231。尹氏復有〈朱陸論難〉，收入《文集》中的別集（卷之1），是在北京時與明朝國子學正陸光祖（五台，1521-1597）論辨朱陸異同之作。

8月2日	從祀孔廟。筆談內容頗長，雙方一來一往，各擁立場，並無交集。		(天津)
5. 8月3日	見陝西人王之符，筆談論王學，雙方一致排王學，視之為偽學，許錞大嘆：「數千里始得此人，豈非幸哉！」	頁 208-211	薊州 (天津)
6. 8月20日	參觀國子監，與監生楊守中論王學從祀之問題，雙方立場一致，同認為良知學是偽學。	頁 255-256	北京

許錞對王學從祀的問題，一開始即感到極度困惑，因而逢人便問陽明從祀之問題。從上述筆談內容中，所有有關陽明學的問題，皆是由許錞主動提出。許錞不僅從筆談中知道王學從祀在明廷引起的爭議，同時這趟中國之行，也讓他驚訝地發現嘉靖九年（1530）陸九淵已經正式從祀孔廟，³²對此許錞評曰：

陸九淵之從祀，則（嚴）嵩之他文有曰，在於嘉靖九年，而我國人全不聞知，誠可驚駭。然則邇來之旅，請從祀王守仁者，實本於此而發也歟。³³

按陸九淵在嘉靖九年入祀，事實上，朝鮮燕行使也充分掌握，事詳於尹月汀文集中，許錞可能不察。³⁴許錞不僅驚駭中國已將陸九淵從祀孔廟，王陽明將來也有可能入祀，其驚訝更不在話下，所以動輒逢人探問陽明從祀之問題。在此，我們看到一位朝鮮儒者不僅嗅出明代學術氣氛的轉變，同時也頗困惑何以天朝

32 《明史·禮志四·先師孔子》載：「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卷50，頁1296。又根據清《續文獻通考》，卷48，〈學校考二〉，載嘉靖九年十一月更正孔廟祀典：「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時以聰力主，眾不敢違，遂定制。」因此，陸九淵的從祀，與陽明弟子薛侃（1486-1545）及當時任內閣首輔的張璁（1475-1539）的極力主張有相當大的關係。關於嘉靖九年世宗皇帝大幅改變孔廟從祀制度的學術與權力之關係，詳參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及〈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二文，皆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1994）。黃進興教授稱世宗的改制為：「更動祀典、進退諸儒規模之鉅，在孔廟發展史中堪稱絕無僅有。」頁270。

33 許錞，《朝天記》，《燕行錄全集》，冊6，頁193。

34 尹月汀一生出往中國凡四次。在前引〈文廟從祀議〉一文中即注意到陸九淵入祀孔廟之問題，如以下記載：「〔前略〕又以薛侃之議進陸九淵從祀，朱陸之辨，雖未易遽言，而我國既專尚朱子之學，而朱子謂陸子靜分明是禪。今乃進陸於從祀之列，使與朱子並列於兩廡之間，未見其可也。臣於嘉靖丙寅，以書狀赴京時，隨例拜聖於國子監而見之。」頁231。

會放任「邪說橫流」而無法約束呢？

萬曆二年（1574），許錡在中國驚訝地看到了天朝居然興起從祀「異端」王陽明之風，我們在下節則要探析十八年後的壬辰倭亂（1592），中國派去支援的袁黃，擔任幕僚職位的軍前贊畫，到了朝鮮，也同樣驚訝朝鮮居然只尊奉朱子學，要求容納陽明學，引起了朝鮮群儒的攻訐。

三、袁了凡其人其學與出使朝鮮經過

袁了凡，原名袁黃，字坤儀，明朝浙江嘉善人，初名學海。據其所著之《了凡四訓》，言其「童年喪父，老母命棄學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而成名，爾父夙心也。」後遇雲南孔先生傳邵雍《皇極經世書》，故亦頗知數理卜算，以為一生榮辱生死，皆有定數。此後，棄醫應科考，為廩生、貢生。一五六九遇雲谷禪師，始悟命可由己心擴充德行，多積陰德，改造定數，乃改名為了凡，以紀念此次「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此後，力斷惡修善，積功累德，命運為之改變，禮部科考得第一，並求得一子，一五八六年復登進士，授寶坻知縣，皆非孔先生之算。此後，根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彭紹升（尺木）所撰〈袁了凡先生傳〉載：「後七年，拔擢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萬曆二十年（1592），會朝鮮被倭難，來乞師，經略宋應昌奏了凡軍前贊畫兼督朝鮮兵。」因與提都李如松（仰城，1549-1598）不合，如松更參劾了凡十罪，回國議處，翌年亦以拾遺被議，乃「罷職而歸，居常善行益切」，《了凡四訓》是其晚年削籍還鄉六十九歲之作，終年七十四。熹宗追敘其征日本有功，贈尙寶司少卿。³⁵袁了凡由於提倡功過格，在晚明甚為盛行，在民間影響力甚於士

35 袁了凡在《明史》無傳，因此生卒年眾說紛紜，比較可靠的史料可參《了凡四訓》中的〈立命之學〉，以及清代彭紹升之〈袁了凡先生傳〉（收入《了凡訓子書詳註·徑中徑又徑徵義合編》（臺北：華藏法師會，1977），頁31-32。另外，有關袁了凡的生卒年考證，可參章宏偉，〈袁了凡生卒年考〉（《中國道教》2007年2期），作者考定袁生於一五三三年（嘉靖12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一六〇六年（萬曆24年）七月，享年七十四歲。章氏之考訂，詳實可據，補充了酒井忠夫的〈袁了凡の傳〉（收入氏著，《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0，頁319-321）認為了凡的生卒月日不可考之闕。最近姚立軍在袁黃出生地嘉興縣《嘉興日報》（2007.07.16，B3版）發表了一篇〈嘉言善行，天地玄黃：關於嘉善之子袁黃的考證〉，特別指出有些史料及網路上有關袁黃資料的描述錯誤，作者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袁氏家乘》和袁黃主編的明萬曆《嘉善縣志》等有關文獻資料，對袁黃祖居地、生長地進行實地考證，以弄清袁黃與嘉善地方文化淵源關係。

大夫之間，《吳江縣志》稱：「萬曆以來，李贄、袁黃之說盛行於世。」晚明劉宗周弟子張履祥（楊園，1611-1674）更稱：「袁黃功過格，竟為近世時人之聖書。」³⁶

至於了凡與陽明學之關係，他在《訓兒俗說》中首揭「立志」以訓兒，曾提到從師王龍溪：

大人之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不但是孔門正脈，乃是從古學聖之規範，只為儒者謬說，致使規程不顯，正脈沉埋。我在學問中，初受龍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後參求七載，僅有所省，今為汝說破。明德不是別物，只是虛靈不昧之心體。此心體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擴之不能大，拘之不能小，從有生以來，不曾減，不曾穢，不曾淨，不曾開，不曾蔽，故曰明德。乃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萬古所常明者。³⁷

由於了凡的傳記太簡，這裡提到的「初受龍溪先生之教」，必須遠溯其父親袁仁（參坡）與王畿（龍溪，1498-1583）的深厚關係。根據王龍溪為了凡父親袁參坡所寫的傳記〈袁參坡小傳〉，提到王艮（心齋，1483-1541）與袁相會，與之語，奇其才，推賞為王佐之才，曾引見給陽明，問良知之旨，但袁終未入籍為陽明弟子。其後，聞陽明逝，不遠千里奔喪，哭之甚哀。袁參坡之子了凡，從龍溪學，龍溪稱之最為穎悟。由此可知，了凡之從學龍溪乃因其父與龍溪之深厚關係。引文中了凡以「虛靈不昧之心體」解釋明德，顯示陽明學精神之特色。

了凡不唯師事過龍溪，也稱羅汝芳（近溪，1515-1588）為師，³⁸由此可窺陽明學的二溪（龍溪、近溪）思想與了凡有匪淺的關係。了凡在上文凸顯「明德」之意後，接著特強調「親民」。他說：

明德不是一人之私，乃與萬民同得者，故又在親民。以萬物為一體則親，以中國為一家則親，百姓走到吾面前，視他與自家兒子一般，故曰保赤子，此是親民真景象。³⁹

36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5，頁117。

37 袁了凡，《訓兒俗說》，收入《了凡雜著》（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建陽余氏刻本影印），頁517。

38 袁了凡在《勸農書·序》中提到：「吾師近溪羅先生常言天下有至易為之事，而人莫之肯為者二焉。為學而致聖人，為治而致太平是也。」《勸農書》，收入《了凡雜著》，頁584。

39 袁了凡，《訓兒俗說》，頁517。

如所周知，以「親民」而不以「新民」解釋《大學》，涉及朱、王的根本學問之不同，了凡在此又以萬物一體解釋親民思想，皆有陽明拔本塞源論的影子。因此，了凡曾經在《群書備考》一書中論及道學，對於朱學獨盛，陸學卻遭排斥，頗為之叫屈，他說：「今朱子之學已大行於世，如日月當天，獨陸氏之學，世儒皆排之如楊、墨。噫！亦冤矣。……而陽明先生亦為一世宗仰，鄒吉士風采可重，惜未究其所施耳。」⁴⁰充分表達對陸、王之學的肯認。

了凡因其三教色彩太濃，後世道家、佛家推尊了凡，遠甚於儒者，故實不可稱為是陽明學者。但是，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了凡對朱王學的態度是王學重於朱學，這當然與其從師過龍溪、近溪，以及他的宗教色彩息息相關。就此種學術傾向而言，在了凡出使朝鮮之際，不難想像當他發現異邦的朝鮮，竟還宗奉朱子學而不容陽明學時，他驚訝的程度當不在許筠之下。

本文在第四節的重點即在於分析袁了凡出使朝鮮，擔任軍事參謀的這段很短的期間，希冀朝鮮儒者能與之辯論，改變以朱子學為宗的態度，引起不小的爭議。但由於中國史料對於這段相當簡略，實無由得知袁了凡在朝鮮的這一段爭議過程。不過，本文扣緊朝鮮儒者對袁了凡的評價，特別是他們批評袁了凡不尊朱子之說，由於這方面有一些文集可資為證，故可補充袁了凡在中國史料中的不足，同時這場由袁了凡在朝鮮所掀起的朱王之爭，堪稱中、朝兩國學術爭議的絕佳素材。

先就中國史料中有關袁黃出使朝鮮的記載，根據《江南通志》所說：

袁黃，字坤儀，吳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寶坻知縣，省重役、裁苛，派築堤，扞海水，闢曠土，擢兵部職方主事時，有援鮮之師，黃疏請赴軍前贊畫。遣奇士馮仲纓、金相往說倭將，約盟解甲，事垂成，為閩帥所忌，遂落職。天啟改元，追叙東征功贈尚寶司少卿。黃博學尚奇，尤精律呂歷法。⁴¹

這裡提到袁黃擔任兵部職方主事時，是自己自願疏請擔任援朝的軍事參謀，這與一般認為是被派任前往有相當大的不同。此外，袁了凡曾擔任過寶坻知縣約五年期間，寫就《寶坻政書》，為日後上任的知縣治政必參之書，號稱寶坻「二百年來，所未有之良牧也」，繼任知縣嘗為之寫序，提到出使朝鮮之事：

在任五年，賢聲赫赫，前後膺二十七薦，最後接會疏薦公備兵海上，

40 袁了凡，《群書備考·道學》（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收入《四庫禁燬叢刊·補編》，冊42，卷1，頁486。

41 清，《江南通志》，卷140，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頁51。

忌者媒孽之，僅僅擢部屬以去。未逾月，即監兵東征，間關異域，功蹟茂著。迺竟以讒歸。讀朝鮮陪臣李元翼所著〈生祠碑記〉，述公之勳勞甚□（按：原文缺）。⁴²

引文提到的朝鮮陪臣「李元翼」應是「李元翼」之誤，李元翼（梧里，1547-1634）在壬辰之役時，擔任平安道都巡察使，兼吏曹判書一職，監督關西兵馬。經查有關文集，李元翼確實有建請立生祠的記載。⁴³不過，可惜的是，所謂〈生祠碑記〉，筆者查閱《梧里先生文集》時，未能得見，因此，內容如何記載袁了凡的功績，僅能闕疑。

有關壬辰之亂的戰爭過程之研究已有不少。不過，筆者要講述袁了凡出使朝鮮的過程，或許也該交代一下袁了凡在援朝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何以被參劾歸國的過程。

萬曆二十年（1592）的五月夏天，甫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出兵侵犯朝鮮，勢如破竹，一口氣攻到朝鮮京城（今首爾），俘虜了王妃、王子，朝鮮國王李昞（宣祖）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根據《明史》的記載：「五月，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王宣祖奔義州求救。」⁴⁴明廷副總兵祖承訓率軍渡鴨綠江支援，僅以身免，中朝震動。明廷在八月，以兵部侍郎宋應昌（思文，1536-1606）為經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統兵討之，袁了凡擔任宋應昌的軍前贊畫，也就是軍事參謀的職位參軍援朝。

十月的冬天來臨之際，明廷派遣名將李成梁（引城，1526-1615）之子李如松率大軍援救朝鮮。翌年正月，李如松的援朝尚稱順利，在平壤大捷，打敗深入平壤的小西行長之日軍，但驕兵必敗，不久即在進攻王京城之戰時，在碧蹄

42 邱賞，〈寶坻政書序〉，收入《了凡雜著》，頁753。

43 李元翼所著〈生祠碑記〉可能亡佚。根據權愈為《梧里李先生文集》寫序即提到：「平生疏奏，多失於兵難，今之存者纔十之一二。」但李元翼確實為明援軍朝的將士們建立過生祠，事載於崔崑（字立之，號東阜、簡易堂，1539-1612），《簡易文集》，卷5，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49，〈槐院文錄·奏戰功〉說：「謹奏，為東征將官功績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據謝恩陪臣金晬等回還啟稱：前在京師，聽得征倭諸將官以東事未了，並未揭功次。得此查照，先該本年四月內，據議政府狀啟，該漢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察使李元翼等各呈都城平壤等處父老軍民等，追感天將除兇救死之功，相與勸帥，爭出錢力，治碑而閣，畫像以祠，願效香火之虔，永世不忘等情。為照。」（頁363）李元翼亦曾出使明廷為當時援朝經理楊鎬因受丁應泰誣告，而前往申救。

44 《明史·神宗本紀》（臺北：鼎文書局，1987），卷20，萬曆二十年載：「冬十月

館遭到日將加藤清正的埋伏而大敗。李如松顯然戰事不力，明廷國內兵部尚書石星（拱辰，1538-1599）亦力主封貢，提議撤兵，到了十二月，明廷下旨：「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⁴⁵獨留劉綎拒守尚在釜山伺機而動的日軍。李如松並非死在援朝之戰，五年後（萬曆26），史載：「夏四月丁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戰死。」⁴⁶李如松援朝的過程中，事實上是不光彩的，這從朝鮮使臣金晬來廷泣言內容可知：「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朝鮮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⁴⁷這是控訴李如松敗戰後和議撤軍，日軍又再度進犯，朝鮮國人無助而被攻下晉州城，使得韓兵將百姓遭屠戮達六萬人之慘劇。

李如松在先勝後敗的過程中，到底袁了凡作為宋應昌的軍事參謀，扮演了何種角色？事實上，從《明史·李如松傳》中，可以窺知李如松與來監軍的宋應昌是不合的。⁴⁸日後雙方和議封貢的偽局，如松的退軍，居中穿線者即是狡猾市儈的沈惟敬，當然還有國內親如松一派的兵部尚書石星。

我們再來看彭紹升的〈袁了凡先生傳〉載曰：

提督李如松，以封貢給倭，倭信之，不設備，如松遂襲破倭於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應行詭道，虧損國體。而如松麾下又殺平民為首功，了凡爭之強。如松怒，獨引兵而東。倭襲了凡，了凡擊卻之，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遺被議，罷職歸。⁴⁹

兩相對照史料，我們發現就軍事作戰而言，李如松因兵敗急欲引兵東歸以為卸

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頁275。

45 參《明史·本紀》，萬曆二十一年之載，卷20，頁276。

46 參《明史·本紀》，萬曆二十六年。

47 事載於《明史·何喬遠列傳》，卷242，頁6286。另，《明史·趙煥列傳》亦載：「男子諸龍光許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期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卷225，頁5921）這裡也指出李如松有通倭下吏之事。

48 《明史·李如松傳》載曰：「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經略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胄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軍，沈惟敬自倭歸，言倭酋行長願封，請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卷238，頁2193。

49 清·彭紹升，〈袁了凡先生傳〉，頁31。

責，製造了一個日本願意封貢的假和談，以作為他撤軍的藉口，而與日軍和議的主其事者，當然就是負責翻譯的沈惟敬。但是，這一撤軍，導致朝鮮使臣金晬所控訴的「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朝鮮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之結果。袁了凡在封貢之議的過程中，顯然得罪了李如松，至有十罪之劾。至於了凡是否有率殘部擊退日軍，朝鮮史料、文集及了凡自己的傳記中皆所未聞，僅見之於了凡所著《群書備考》之〈備倭〉一條，載曰：「家君督師渡鴨綠江，以親兵千餘破倭，降（加藤）清正於成境，三戰斬馘二百二十五級，俘其先鋒將葉實，恥於自敘，止發塘報。」⁵⁰

袁了凡作為軍事參謀而出援朝鮮，來自所謂的「天朝」，其地位與許筠來「天朝」的賀誕使節團，實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可以說是「居上臨下」，朝鮮君臣均須禮敬袁了凡。以下我們要檢視袁了凡在軍事以外的學術上，引起了朝鮮群儒何種爭議漣漪。

四、袁了凡詆朱衛王論在朝鮮引起的爭議

中國使臣到了朝鮮，除了例行的任務以外，其一言一行，往往動見觀瞻。而能被特別記載下來的，往往事涉兩國的敏感事件。例如袁了凡要求觀看朝鮮的《國朝大典》一事，朝鮮國王宣祖便加以拒絕，為的是防止中國使臣看到王朝更迭之際，前朝有些忠臣死節之事。⁵¹使臣們的言行中，事涉兩國敏感之事件，當然還包括對陽明學的受容程度，這件事情比起觀《國朝大典》來，更加深兩國君臣之間的緊張關係。以下論之。

袁了凡擔任經略宋應昌的軍事參謀，也許宋應昌的學術傾向偏重王學或其本身對三教本有比較包容的態度，⁵²這些都與袁了凡的學術與宗教性格類似。

50 袁了凡，《群書備考·備倭》，卷4，頁675。按此段史料係了凡之子在〈備倭〉之文中加入註寫，故稱了凡為「家君」。

51 宣祖拒絕袁了凡觀看《國朝大典》之事，見之於金字顯（東岡，1540-1603），〈請許袁主事求書籍啟〉，載曰：「袁公求觀大典，自上不許，蓋以圃隱鄭先生死節處，不欲使中朝人知之也。先生（按：即東岡先生）啟請許之。略曰：『主事要看東國之史，非有他意，只是欲廣異聞，要知海外風俗耳。或者以為鄭夢周死節之事，不可示於上國，臣以為不然。自古國家興亡之際，必有伏節死義之臣，此乃人紀之所以立，若無此等人，乃是無人紀之國耳。夢周之盡忠前朝及我朝之褒崇節義，兩得其道，正是邦家之光，何必固諱於上國乎？臣意許看東史，似無不可。』」此文收入《東岡先生文集·附錄》，卷之4，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50，頁506。

52 《明史》中有關宋應昌的記載，皆不涉其學術傾向，筆者大膽假設宋之學術傾向喜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位援朝的明廷士大夫，到了朝鮮後竟要求朝鮮國王應講「明德、親民之學」，事載於《朝鮮王朝實錄》。朝鮮國王宣祖道：

上曰：「予言經略之過，雖未安，而其為人陰險且譎，見其氣象，察其舉措，則亦可知矣。渠入亡國之地，置酒張樂於統軍亭，此亦荒唐。且以為當講學，勸予講明德、親民之學。」成龍曰：「此人不可與言學問矣。」上曰：「若如王陽明，則猶或可也。」⁵³

如所週知，所謂「明德、親民」之學是王陽明反對朱子支離學問的核心要點，陽明有名的〈大學問〉即發揮明德、親民本爲一事之說，反對朱子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之分。⁵⁴在中國史料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中國使臣要求朝鮮上下改變學術等之類的記載，但卻鮮明地記載於朝鮮文獻中。宋應昌在軍事倥傯之際，還要求面臨國家存亡的朝鮮上下講學，恐怕是想效法王陽明於戰陣之中仍與士友坐論講學不輟。宣祖等君臣當然深感疑惑，加上對宋應昌的觀察後，給予的評語是「爲人陰險且譎」，與陽明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宣祖才會說：「若如王陽明，則猶或可也。」顯然，宣祖也非常了解王陽明的軍事與講學合一之事蹟。

宋應昌要宣祖在國家生死存亡不廢講陽明學，袁了凡則要與朝鮮士大夫論學，企圖扭轉朝鮮的尊朱學術風氣。有關朝鮮儒者對袁了凡詆朱尊王的爭議，根據朝鮮儒者閔仁伯（苔泉，1552-1626）的記載：

時兵部事袁黃，與周御使維翰，宋徑略應昌東來。黃字坤儀，號了凡，性好佛，嘗與領議政崔興源論學，因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無間然矣。」主事不悅。翌日移咨舉《四書》註疏，逐節非毀之。朝廷命先生（按：指成牛溪）代崔作書。⁵⁵

職是之故，成牛溪（渾，1535-1598）乃有〈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黃書〉，對於事件始末，載之更詳，內容如下：

王排朱，因宋應昌出身浙江仁和縣，與陽明學的發展地有地緣之關係，此其一；另根據時人楊時馨對宋應昌之評價，提到宋「崇信左道」，此其二。如《河南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以下之記載：「楊時馨，字維德，祥符人，萬曆甲戌進士。工部郎中，督慈寧乾光工及邠哀王仙居公，主鑿節省浮費，羣璫共銜之，有將臨閱，故毀工所垣冀，激上怒。時馨不為動，補山東副使。時巡撫宋應昌崇信左道，時馨面折之，失應昌意，遂掛彈章歸。」卷57，頁105。

53 《朝鮮王朝實錄》，冊26，卷45，宣祖26年（1593，萬曆21）閏11月2日，頁2。

54 詳參王陽明，〈大學問〉，收入《王陽明全集》，卷26，頁967-973。

55 閔仁伯，《苔泉集·龍蛇追錄》，卷3，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59，頁50。

時袁黃以贊畫來定州，與崔興源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翌日，示一書于行朝，題曰：「為闡明學術事，自程朱之說行，而孔孟之道，不復明于天下，天下貿貿焉聾瞽久矣。我明興，理學大暢。近日聖天子玄鑑朗悟，契心堯舜，當朝宰輔，皆是大聖大賢，相與揭千古不傳之祕，盡掃宋儒支離之習。惜汝國僻在一隅，未得流布，乃親傳奧旨。」云云。因摘示朱子《四書集註》十餘條，其末曰：「吾輩今日工夫，只學箇無求無著便是聖人，至簡至易。較之朱說，孰非孰是。」行朝諸公議所以酬答，而難其措辭。其推先生。先生乃草答辭以報之。略曰：「小邦僻在遐遠，伏蒙皇朝頒賜《五經四書大全》，表章先儒之說，列於學官，頒行天下。小邦之人，無不誦習而服行，以為此說之外無他道理也。今者邦國垂亡，上下皇皇，講學之事，請俟他日。」袁見之默然。未幾，袁以學術邪僻，左道惑眾，逢科彈而去。

後先生書袁黃著書卷後曰：「袁黃之才，長於論兵論稼，可為令長，或可為參謀戎幕，而謾以知道自詡，安有口誦南無，手畫真言，而有知道者乎？世衰妖興，一至於此哉。」⁵⁶

上述之文，袁了凡清楚地表達排斥朱子學的立場，而且摘示朱子《四書集註》十餘條，在最後所說：「吾輩今日工夫，只學箇無求無著便是聖人，至簡至易。較之朱說，孰非孰是。」尤可看出是陽明學立場。⁵⁷袁了凡批評朱注四書，《明史》亦曾記載，⁵⁸並非只有到朝鮮才如此。如前節所述，陽明在萬曆十二年已經入祀孔廟，得到正面的對待，並且信者頗眾，袁了凡便是其中之

56 成牛溪，〈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黃書〉，《牛溪先生年譜》，卷之1，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43，頁247。

57 如成牛溪〈雜著〉所說：「袁盡力排程朱之學，其說專主禪陸。」《牛溪先生集》，卷之6，《韓國文集叢刊》，冊43，頁155。

58 《明史》，卷281，記載龐嵩時，載曰：「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毀。」顯然，袁黃的批削《四書集注》的著作《四書刪正》，曾經遭到毀版。了凡在《四書刪正》的凡例表達了以舉業尊朱的批評：「洪武開科四書朱傳，仍元制也。永樂以一人之見不足盡六經之旨，下詔徵集群儒，輯《四書五經大全》，頒天下學宮，令士子傳習。……如徒以尊朱為名，而盡廢眾說為妄庸，則亦何難之有。弟恐束書下觀，固陋就簡，舉業從此日卑，士風從此日薄，關繫於國運人心不淺耳。」轉引自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頁332。

一，但也不至於到袁了凡所謂的「漸不宗朱」，畢竟科考仍以之取仕，官方仍以之為正統學術，成牛溪等朝鮮儒者對中國的學術印象也是如此。

成牛溪面對這位前來援朝的軍事參謀，竟要求朝鮮改變宗朱的學術立場，既要保住國格，又要對這位天朝使者保持適度的尊敬，便以其人之道，還之其身，故言朝鮮之所以宗朱，也是根據「皇朝頒賜五經四書大全」而來，並且朝鮮上下面臨外寇之際，並不是辯論學術的時機，也順便提醒袁了凡來朝的任務及身份，可謂反將了袁了凡一軍。此外，袁了凡何以不久去職，果真如成牛溪這裡所說的「左道惑眾，逢科彈而去」嗎？筆者認為，恐未必盡然。袁了凡的去職，有關「左道惑眾」，應只是李如松所參劾的「十罪」之一，並不是唯一。其他「罪狀」當是與李如松等人有關軍事策劃及行動上的衝突，了凡自己在《群書備考》卷四的〈備倭〉一條中提到：「黃力言戰不如守，與眾議不合，後黃遂罷歸。」⁵⁹

袁了凡這般詆朱崇王之論，當時朝鮮儒者有諸多的記載，筆者檢索《韓國文集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及相關著作之結果，列相關的以下七條：

表二：朝鮮儒者對袁了凡詆朱崇王論的相關記載

出處	記載事蹟
1. 成牛溪， (1535-1598) 〈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黃書〉	已引於前述正文，故略。
2. 閔仁伯 (1552-1626) 〈龍蛇追錄〉	時兵部事袁黃，與周御使維翰，宋徑略應昌東來。黃字坤儀。號了凡。性好佛，嘗與領議政崔興源論學，因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無間然矣。」主事不悅。翌日，移咨舉《四書》註疏，逐節非毀之。朝廷命先生（按：即成牛溪）代崔作書答袁曰：「小邦僻在遐遠，學未通方，嘗仰中國書籍，以為口耳之資，伏遇皇朝頒賜五經四書大全，表章先儒之說，列於學校，頒行天下。小邦之人，無不誦習而服行，以為此說之外，無他道理

59 袁了凡，《群書備考·備倭》，頁675。了凡為了主和不主戰，曾經上書給兵部尚書石星，力陳八不可，事詳於〈備倭〉條，由了凡之子補充這段上書內容。另外，了凡到底被劾哪些罪名，是否真有十條？由於史料不明，僅能闕疑。但筆者至少可拼湊以下幾項：(1)前述的主和不主戰；(2)反對封貢之議；(3)左道惑眾；(4)當寶邸縣令時，縱容百姓逃欠官稅數千兩，此事亦載於前引〈備倭〉條。

	也。今茲小邦不天，妖賊殛喪，老爺閣下受命來討，贊畫軍務之外，旁及講學之事，諄諄開導。牖以小邦迷昧之失，揭示前古不傳之秘，甚盛舉也。第緣興源等，末學膚淺，思慮荒蕪，其何能言下領悟，發微詣極，以仰承老爺之至恩乎！今者邦國垂亡，上下遑遑，凡在陪臣，久困行間，平日所知，失亡殆盡。不得紬繹舊聞，以求正於有道。伏願老爺俯鑑微悰，哀而憐之。講學之事，請俟他日。」主事見之，默然不悅。及還渡江，言官劾其左道惑眾，革職回籍。
3. 張維 (1587-1638) 〈牛溪先生神道碑銘〉 ⁶⁰	天朝贊畫袁黃，詒書論學，專紬程、朱，諸公難其對，屬先生草答，辭遜而理正，袁不能復難。
4. 申欽 (1566-1628) 〈宋應昌以下諸官一時往來衙門〉 ⁶¹	袁黃字坤儀，號了凡，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戌進士。壬辰以欽差經略贊畫防海禦倭軍務，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同劉員外出來。一路館站，置標下差官，禁其作拏。性好佛道，持身如山僧。嘗與我國議政崔興源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無間然矣。」主事頽然不悅。翌日移咨，舉《四書》註疏，逐節非毀之。遣馮仲纓于安邊賊壘，欲圖回兩王子，不果出。未久，言官劾其左道惑眾革職，癸巳六月回去。（按：癸巳六月，即萬曆 21 年 6 月）
5. 南有容 (1698-1773) 〈禮曹判書俞公行狀〉 ⁶²	故昔在皇明，士人朱夏季著異書，文皇帝見之大怒，以為儒賊，杖其人火其書。萬曆中經畧袁黃， ⁶³ 非毀朱子，重被臺參，遂廢不復。明王衛道之功，豈非萬世法乎？朱子經書註解，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今者朴世堂敢以朱子為可毀也，註解為可改也。割裂章句，顛倒義例，其亂經悖常，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醜辱先正臣宋時烈，至比亂政大夫。 ⁶⁴
6. 金鑣（士精） (1766-1821) 〈再造藩邦志·三〉 ⁶⁵	經畧乃檄兵部主事袁黃，監察御史周維翰，遊擊將軍高徹、施朝卿等回去。袁黃之初到義州也，遣幕下士馮仲纓於安邊賊壘，欲圖回兩王子，而不果出。又嘗與領議政崔興源論學，

60 《谿谷先生集》，卷之13，碑銘，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2，頁203。

61 《象村稿》，卷之39，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72，頁269。

62 《雷淵集》，卷之25，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17，頁531。

63 袁黃的官職非「經略」，乃「軍前贊畫」。

64 此引文雖未直接敘及袁黃朝鮮詆朱事件，亦列此供參考。

65 收入《大東野乘》，卷之37。《大東野乘》編者不詳，確實成書年代亦不詳，乃十

	<p>因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無間然矣。」主事頽然不悅。翌日移咨，舉《四書》註疏，逐節非毀之。時成牛溪渾自成川承召入行在，人爲之倚重。〔中略〕</p> <p>至是渾承朝廷命，代崔興源作書答袁主事，其書曰：小邦僻在遐遠，學未通方，常仰中國書籍，以爲口耳之資。伏遇皇朝頒賜五經四書大全，表章先儒之說，列於學校，頒行天下。小邦之人，無不誦習而服行。以爲此說之外，無他道理也。今茲小邦不天，妖賊殛喪，老爺閣下受命來討，贊畫軍旅之外，旁及講學之事，諄諄開導，牖以小邦迷昧之失，揭示前古不傳之秘，甚盛舉也。第緣興源等末學膚淺，思慮荒蕪，其何能言下領悟，發微詣極，以仰承老爺之至恩乎。今者邦國垂亡，上下皇皇，凡在陪臣，久困行間，平日所知，死亡殆盡。不得紬繹舊聞，以求正於有道。伏願老爺俯鑒微悰，哀而憐之。講學之事，請俟他日。</p> <p>主事見之，默然不悅。既回渡江至遼，言官劾其左道惑衆，革職回籍。</p>
<p>7. 南克寬 (1689-1714) 《夢嚙集·雜著》⁶⁶</p>	<p>李贄之出，風俗一變，猖狂無忌憚之言，皆自此人當爲罪首。是固氣機之變衰虛幻，非人力也。然其論皆昧於「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一句，必以發而直遂爲第一義。今夫塗之人，見列肆之貝，其不欲攫而歸也者，鮮矣。循此輩之論，必攫而後可也，豈不悖哉！牛溪跋袁黃之書曰：「世衰妖興，一至於此。」斷之確矣。</p>

按：以上七條所述有關袁了凡詆朱之論在朝鮮儒者的記載，內容大同小異。不過第五項提到「朴世堂敢以朱子爲可毀」，並將之與袁了凡同列毀朱之罪，顯見袁了凡之論或多或少也引起了少數朝鮮儒者的共鳴。朴世堂（西溪，1629-1703）著有《中庸思辨錄》（1687完成）、《論語思辨錄》（1688完成）兩書，內容多有質疑朱子學，引起館學儒生上疏其罪，要求其書毀版，年七十五竟遭削奪官爵，判流放遠地玉果，然因其年事已高，經陳情而得以還歸。⁶⁷

八世紀初期的作品，主要收入一些稗官野史之著作。計有72卷。1971年開始由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重新整理出版。

66 《夢嚙集·雜著》，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09，頁312。

67 批判朴世堂的儒者頗多，僅以魚有鳳（杞園，1672-1744）的〈代太學儒生請罪朴世堂〉所載爲代表：「臣等竊伏見前判書臣朴世堂，本以拗戾之性，偏滯之見，挾其恬退之一節，矜其文字之小技，聚徒教授，敢以師道自居。而其所以說經解義者，必以務勝前人爲能，聞其於朱夫子《四書章句集註》，多所疑亂改易，著爲成說，

宋應昌要求朝鮮上下講陽明學及袁了凡的詆朱尊王之論，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去職而告一段落。壬辰之亂結束後，經略楊鎬（風筠，?-1629，萬曆二十六年因被參劾去職）及接續的萬世德等，均曾行文要求朝鮮孔廟的從祀牌位須與中朝一致，其中當然包括陸九淵與王陽明從祀的問題，也引起不少爭議，事載於宣祖三十七年（1604，萬曆32），根據禮曹判書許箴（1548-1612）等的奏文說：

經理（按：指萬世德）之至於移咨，欲其歸一者，其意亦欲進之於中國也。當此之時，其不當自勉以進於道乎？天朝既有成式，在我藩國之道，所當遵而行之，斯為得體。他日華使見之，亦必喜聖朝文教東漸之盛，而亦尚我國典制之得正矣。但從祀中，如陸九淵、王守仁輩，皆以異學，得罪於聖門，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而因一時一二人強執所見，寘之衛道酬功之中，實非天下公共之論。厥後，覈非辯偽之章，往往相續於通報中，天朝人心之至今不服，蓋可想矣。此則似在更議中。⁶⁸

中國這些派駐援朝的軍事將領，這樣要求朝鮮國王必須遵從中朝之制安置孔廟從祀排位，朝鮮上下並沒有屈服，君臣討論的結果，宣祖裁以「姑待日後，更議處之」。顯然沒有接受這項依隨中朝入祀聖廟的方式，當然也不可能將陸、王入祀聖廟了。

以上的分析讓我們見識到中國援朝的經略及軍事謀臣，常有干預朝鮮學術的事例，從宋應昌、袁了凡、楊鎬到萬世德等諸人，他們從「天朝」而來，頤指氣使，企圖改變朝鮮尊朱子學或孔廟從祀牌位的定序，從其失敗的結果來看，讓我們見識到朝鮮強烈尊朱子學甚於中國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們所引起的懷疑朱子學之爭議，或許也埋下了種子，伺機發芽。

積有年所。而近又因撰出故相臣李景奭碑文，誣辱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不遺餘力。」氏著，《杞園集》，卷之9，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84，頁8。有關朴世堂以詆毀朱子遭叛流放，其門人上疏請救，事亦載於《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38卷，29年（1703），4月23、28日。

68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180卷，37年（1604，萬曆32），10月17日。經理楊鎬、萬世德行文移咨朝鮮國王孔廟入祀順序應依照中朝故事，事亦見《朝鮮實錄·光海君》，31卷，2年（1610，萬曆38），7月20日。

五、結論：從陽明學爭議問題看區域交流史的研究意義

本文嘗試從中韓區域交流史的觀點，選擇十六世紀末許筠及袁了凡兩位核心人物，扣緊他們對陽明學的態度，透過彼此史料文獻的對照，一窺彼此對「異區」學術文化的敏感觀察之課題，最後擬藉此呼籲國與國之間的區域交流史研究的多元多樣性之意義。

我們若從區域交流史的多元交錯觀點，進一步審視過去的史料記載，將會使過去文化現象呈現更多元或立體的風貌。質言之，當我們發現在「異區」對於同一事件或人物等「歷史共同課題」的看法或評價，竟會有不同的歷史解釋與價值判斷時，將會打破以往只限定在一國史觀的前見解，從而打開基於平等的互相交流態度，試圖同理心地去了解「異區」（對方）之文化現象，何以會有與自己所處的文化價值觀不同，進而企求一個互為主體性的多元解釋觀點。

例如從本文的研究指出，許筠在中國的衛朱斥王之舉，雖然中國史書皆不載，但對朝鮮儒者而言，堪稱壯舉，如《朝天記》之序文作者記曰：「歷正學書院，弭節於首善之館，能孤倡正大之論，以抗群咻，而不震不沮，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耶！」⁶⁹相較而言，袁了凡在朝鮮詆朱護王之論，引起朝鮮儒者的沸沸揚揚、陣陣筆伐，但在中國史書及本人亦皆不載。以上皆是一國知識人進入他國後，在「異區」發生的摩擦或糾葛，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為何許筠進入中國後逢人便筆談陽明學從祀問題？而袁了凡到了朝鮮後的詆朱言論，為何竟會惹起軒然大波？這個問題觸發我們去挖掘到原來朝鮮儒者甚至國王也正密切觀察中國的陽明從祀問題，而朝鮮儒者之所以反應甚於中國儒者，這背後當然牽涉到「文化正統意識」的重要課題。換言之，中國作為當時的「天朝」，竟然允許威脅「文化正統意識」的「異端」（陽明學）可從祀孔廟。基於這種憂心「文化正統意識」的動搖，我們便可理解朝鮮儒者正是在這種萬一明朝都不再「中華」後，則能夠肩負維護此項「文化正統」任務者，當然非朝鮮莫屬，這也就是許筠會說出：「邪說橫流，禽獸逼人，彝倫將至於滅絕，國家將至於淪亡，此非細故也。」此也涉及到向來存在於朝鮮知識份子的「小中華」意識，⁷⁰一旦「中華」「不華」之後，則朝鮮只能肩負「華者」

69 許筠，《朝天記》，頁18。按：此序文作者書為「遠志山人」。

70 朝鮮儒者當然不稱自己是「夷」，故以文化禮儀來判定「華」與「夷」，往往稱自己是「小中華」，如《成宗實錄》載有：「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朝鮮王朝實錄》，冊4，卷20，成宗3年（1472），7月10日，頁4。明朝義州宣慰使到了朝鮮，也對朝鮮國王成宗說道：

的角色，此即為何朝鮮儒者會如此關心陽明學從祀的問題，以及在中日韓三個國家之中，為何最不能受容陽明學，只要從保護「文化正統」意識來看，便可一目了然。尤其在明亡後，朝鮮仍同時沿用明朝及清朝正朔，也是小中華意識的文化反應心態。⁷¹

除了人物與事件的歷史評價問題以外，有關的學術爭議也需從跨國的多元視角始能進一步釐清，因為有許多事件或爭議常有存此失彼或此說彼諱的問題。如本文所分析的陽明學從祀問題，許篈與中國士人的筆談觀點，以及宋應昌與袁了凡到了朝鮮後要求朝鮮上下講陽明學一事，這些言行在中國史料皆無，卻活生生地被記載在朝鮮史料或文集之中。挖掘出這類當時的敏感課題，將形成一項別具反省且有意義的東亞文化的多元交錯現象。

從袁了凡與許篈的出使異國經驗所發表的言論來看，陽明學看似在十六世紀末以前的朝鮮幾被封殺，雖有如徐花潭門人南彥經（東岡，生卒年未詳，十六世紀末期儒者）頗好陽明學，以及李球（蓮坊，?-1573）的動靜論亦似陽明之學，但畢竟無人敢自稱宗主陽明學。不過，如果我們觀察到陽明學從祀問題延燒到朝鮮君臣經筵的討論，朝鮮國王宣祖在一些的問答上，甚至都表達了對王陽明的好感，可見陽明學在朝鮮並未如我們想像的，幾乎沒有發展的空間。我們不禁好奇的想問：在壬辰倭亂之後，朝鮮便出現了宗主陽明學的鄭齊斗（霞谷，1649-1736），此後並開出江華學派，似乎陽明學仍有一股健動活潑現象在朝鮮不斷地潛流著。再者，袁了凡及一些出使朝鮮的使臣們的詆朱衛王論及其三教融合態度，是否真的沒有起到影響的作用，當我們發現此後朝鮮儒者的一些實學派者如李瀾（星湖，1681-1763）、丁若鏞（茶山，1762-1836）等陸續出現時，掀起對朱子學重新評價的學風，則類似袁黃的詆朱衛王之論以及陽明從祀之論在朝鮮也許產生了發酵作用，尤其這些實學派們對宗教（甚至是基督教）的開放受容態度。只是這些問題已非本文所能處理，容諸後續研究來加以澄清。

「朝鮮實是如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朝鮮王朝實錄》，冊31，卷208，成宗18年（1487），10月12日，頁5。換言之，「小中華」不僅朝鮮人自己稱之，也得到中國儒者的認可。

71 有關朝鮮王朝對明朝及明清鼎革之際的小中華文化意識心態之分析，可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想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一書，特別是第一章第二節，頁33-62。

引用書目

(一) 韓國原典史料

- 《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58年太白山四庫本。第4、25冊。
- 李退溪，《退溪先生文集·答柳而見》，卷之35，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30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 柳希春，《眉巖先生集·經筵日記》，卷16，《韓國文集叢刊》，第34冊。
- 成牛溪，〈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黃書〉，《牛溪先生年譜》，卷之1，《韓國文集叢刊》，第43冊。
- 成牛溪，《牛溪先生集·雜著》，卷之6，《韓國文集叢刊》，第43冊。
- 金宇顛，《東岡先生文集·附錄·請許袁主事求書籍啓》，《韓國文集叢刊》，第50冊。
- 閔仁伯，《苔泉集·龍蛇追錄》，卷3，《韓國文集叢刊》，第59冊。
- 申欽，〈宋應昌以下諸官一時往來衙門〉，《象村稿》，卷之39，《韓國文集叢刊》，第72冊。
- 張維，《谿谷先生集·牛溪先生神道碑銘》，卷之13，碑銘，《韓國文集叢刊》，冊92，頁203。
- 朴世采，《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正集·雜著·文廟配從說》，《韓國文集叢刊》，第140冊。
- 南有容，《雷淵集·禮曹判書俞公行狀》，卷之25，《韓國文集叢刊》，第217冊。
- 魚有鳳，《杞園集·代太學儒生請罪朴世堂》，《韓國文集叢刊》，第184冊。
- 趙憲，《東還封事》，收入《燕行錄全集》，第5冊，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 許筠，《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第6冊。
- 許筠，〈荷谷先生年譜〉，收入《燕行錄全集》，第6冊。
- 金鑣，〈再造藩邦志·三〉，收入《大東野乘》，卷之37，民族文化推進會，1971。

(二) 中國史料

- 《明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6。
- 明·王陽明著，吳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沈德符，〈四賢從祀〉，《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明·徐階，〈陽明先生像記〉，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袁了凡，《訓兒俗說》，收入《了凡雜著》，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建陽余氏刻本影印。
- 明·袁了凡，《勸農書》，收入《了凡雜著》。
- 明·袁了凡，《群書備考》，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收入《四庫禁燬叢刊·補編》，第42冊。
- 明·薛侃，〈請從祀疏〉，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清·《江南通志》，卷140，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清·彭紹升，〈袁了凡先生傳〉，收入《了凡訓子書詳註·徑中徑又徑徵義合編》，臺北：華藏法師會，1977。

（三）近人研究

- 甘懷真，《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 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想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詮釋的辯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7。
- 姚立軍，〈嘉言善行，天地玄黃：關於嘉善之子袁黃的考證〉，《嘉興日報》，2007年7月16日，第B3版。
- 朱鴻林，〈陽明從祀典禮的爭議和挫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5，1996。
- 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氏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朱鴻林，“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 (1988).
- 章宏偉，〈袁了凡生卒年考〉，《中國道教》，2007年2期。
- 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1994。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收入《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0。

夫馬進，〈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國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上）》，東京：汲古書院，1990。

中純夫，〈王守仁の文廟從祀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國と朝鮮における異學觀の比較——〉，收入奧崎裕司編，《明清はいかなる時代であつたか——思想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

김동진（金東珍），〈허봉의 대명사행과 양명학 변척〉（〈許筠的大明使行與陽明學辨斥〉），《문화사학》（《文化史學》），21輯，2004。

Debates on Yang-ming Learning by Chinese and Korean Envoy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Significance: With Emphasis on Heo Bong and Yuan Huang

Chang, Kun-ch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wo controversies created by envoy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from Joseon Korea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Yang-ming learning in each country. It will also illustrate the interactions concerning Yang-ming learning through envoys. The first controversy focused on Wang Yangming himself as he became an adjunct object of worship at the Confucian Temple. This occurred in 1547 when the Joseon envoy, Heo Bong (1551-1588), crossed swords with Chinese literati and scholar-officials over Wang's part through written communication. The second controversy arose in 1592 when the Ming Dynasty sent a military staff officer, Yuan Huang (1533-1606), to advise Korea on her war against Japan. Yuan provoked a conflict with the Joseon Confucians by slandering Zhu Xi and defending Wang Yangming.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different arguments by intellectuals from both countries on Yang-ming learning. Moreover,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Yang-ming learning in East Asia will also be explored.

Keywords: envoy, Yang-ming learning, Heo Bong, Yuan Huang, Yang-ming learning in East Asia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